

文史

第四期

4-721
(1990)

政协大连市中山区文史资料委员会



日寇统治大连时期贩卖鸦片

毒害中国人民的罪恶史实

唐树富 黄本仁

鸦片烟是残害人民健康的毒品。1840年英帝国主义就以贩卖鸦片烟做为侵害中国的手段，其罪恶目的不仅是榨取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血汗，更严重和毒辣的是通过人们吸食鸦片上瘾后，身体衰弱，再要想反抗外来侵略者已力不从心，从而实现帝国主义对我民族“亡国灭种”的罪恶阴谋，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爆发了抗英的反侵略战争。中国人民为此做出了重大牺牲，这一惨痛历史教训，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1905年日寇侵占大连后，竟步英帝国主义之后尘，来一个故技重演，以殖民地大连的特殊地理环境和条件，大规模地贩卖和

走私鸦片烟，既可获得暴利，又可实现其“不战而胜，亡我中华”的罪恶阴谋。

一、官卖机构的“广膏局”

1906年日本殖民当局碍于国际舆论，不便公开进行贩卖鸦片，而是通过在日俄战争中搞情报工作出名的日本大特务石本贯太郎出面搞贩卖鸦片烟。石本贯太郎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是日军司令部的通讯官，1904年日俄战争中，又担任日军随军翻译，日本侵占大连后，他极力为殖民统治机构服务，并向殖民当局献策说：“帝国在台湾实行鸦片专卖，每年占财政总收入42%。在大连广开烟馆，既可使支那人麻木不仁，又可为帝国广致财富，乃是一举两得……”。1906年夏天，把他于日俄战争搞间谍工作时雇用的汉奸潘忠国（金州人又名干巨）介绍给日寇殖民统治首脑——关东都督大岛义昌，经大岛批准，发给潘忠国阿片贩卖许可证（日本人称鸦片为“阿片”，下同）。实际上潘是顶名，一切大权都操纵在石本手里。这样日本殖民统治者想给大连居民一种错觉，好像贩卖鸦片烟是中国商民申请于烟，与日本方面没有关系。潘忠国经营鸦片烟买卖一年多，规模小、利润少，殖民当局很不满意，密令石本贯太郎亲自出面经营贩卖鸦片，关东都督府特发给石本贯太郎“阿片输入批发的特许证”。从此石本贯太郎由后台走到前台，大规模地从海外进口鸦片，并由他在大连独家批发推销。凡中国人开

设大烟馆者，只需到石本那里购买，不需要其它牌照。

随着大连城市建设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消费事业也开始繁荣。石本为了扩大业务，在殖民当局大力扶持下，石本设立一个“民办”的贩卖鸦片烟机构，叫做“广膏局”，地点在今中山区中山广场附近，聘用中国人刘绍周、袁永平、盛耀亭等人担任业务员。广膏局规定，凡开业的大烟馆只准到广膏局购买烟膏，否则就算违法。这个垄断鸦片烟买卖的广膏局，谁给它这种权力？当然是日本当局，因此所谓“民办”的花招，自己给自己戳穿，实际上是一个地道的日本官方所办的大规模贩烟机构。

广膏局是采取把鸦片熬成膏子，然后以铁桶作包装，大桶装重为10两，小桶装重为5两，其定价分别为2元和1元（日元）。这种烟膏不能马上吸用，必须另买较好的烟土（鸦片别名）掺合过滤，再次熬成烟膏，改装入小纸包，每包售价2角（小洋）。到1913年前后，经广膏局的“广为推销”吸食鸦片者人数越来越多，一时之间鸦片烟竟成为人与人之间交际必备品，犹如今日以卷烟待客，因而全市大烟馆竟达百户左右。广膏局的官办性质，使它垄断了全市的鸦片批发和输入，利润之大，局外人无法得知。殖民当局对石本的经营有方非常满意。鸦片烟是对人民的身体健康非常有害的毒品，日本政府利用大连殖民地的特殊条件，公开大规模地贩毒，这是符合他的对华“亡国灭种”的基本国策。中国人吸食鸦片者愈多，日本当局愈是开心，它鼓励石本要大于特干，日冠这种丧

心病狂、灭绝人性的罪恶活动，天长日久终会暴露于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面前。

二、挂羊头卖狗肉的“宏济善堂戒烟”部

日本殖民当局利用所谓民办的“广膏局”，在大连公开贩卖鸦片，这个丑行暴露后，国际禁毒组织对日本政府强烈谴责，各国舆论界也纷纷揭露。大连殖民当局在正义面前也慌了手脚，为了避人耳目，把害人不浅的广膏局立即撤消，对外声称大连地区正在掀起“戒烟”活动。

殖民当局经过一番筹划，认为对华进行“亡国灭种”的贩卖鸦片的基本国策是要坚决贯彻到底，决不能有丝毫动摇，但为了欺骗国际禁毒组织和世界舆论，竟搬出了一个绝妙高招，用“戒烟”之名、行贩烟之实，这样国际舆论就不能说三道四了。

1914年在日寇殖民当局主持下，成立了一个所谓“宏济善堂戒烟部”。宏济善堂是华商发起组成的慈善机构，早在沙俄侵占大连时期，华商组织洼口公议会曾开办宏济彩票局，盈余达数万元。大连沦为日本殖民地后，华商组织之华商公议会即以此款创建“宏济善堂”。它的主要业务是恤寡抚孤、育婴养老、施棺义葬，并创办病院常年为贫苦患者免费施诊，严冬季节还发放棉衣并常期施粥，确实做了不少有利于广大贫民的善举。宏济善堂又看到广大烟民上瘾后，弄得倾家荡产、废时失业、流落街头，所以根据慈善之宗旨，

拟定“戒烟”方案，预备进行搞“戒烟”业务。殊不知这是和殖民当局唱对台戏，所以一直没有得到殖民当局的同意。这一回殖民当局想起了这件事，不用宏济善堂催办，一夜之间就批准该善堂成立“戒烟部”。但“戒烟”怎样个戒法，宏济善堂不能过问，弄得宏济善堂摸不清头脑，处于非常被动地位。

1915年1月日寇关东厅长特以指令形式下达给宏济善堂总理郭精义（时任大连华商公议会总理）对戒烟的具体业务，交待得非常清楚，指令的主要内容是：

1、对大正三年（1914年）12月8日165号指令（由石本贯太郎经营之广膏局特许证）现予撤消，特指定宏济善堂为关东州之阿片输入和贩卖人；

2、宏济善堂之事业分慈善部和戒烟部，两个部应分别管理（人事与财会核算）；

3、戒烟部之业务受大连民政署长直接指挥与监督，戒烟部设理事掌管一切事务，其人选由大连民政署长推荐之；

4、输入阿片时，每年度输入阿片之品种、数量、输入商号之名称，必须于前年度之十二月份提出具体计划，报请大连民政署长批准。阿片输入后，应立即报告大连民政署长，并接受其检查；

5、每年4月1日至9月30日为第一事业期，10月1日至翌年3月31日为第二事业期，作为会计结帐之期限。结算清楚后，不得迟于二个星期，将全部纯益上交给大连民政署。

从上述文件中，赤裸裸地暴露了“戒烟部”的实质，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名为戒烟，实为贩烟。是利用“慈善”“戒烟”之美名，作为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不再受历次在海牙召开的万国禁毒会议通过的规定约束和各国人民在道义上的指责。

宏济善堂戒烟部成立后，善堂的总理郭精义不但对戒烟部一切无权过问，还得担负贩烟的污名。大连老百姓都指责慈善机关不应干这种缺德事，可是他们那里知道这是日本侵略者用暴力强加于宏济善堂的，既不能反抗又不能声辩，从此宏济善堂便长期背上黑锅。

宏济善堂戒烟部成立后，原石本贯太郎的广管局业务人员都没有被聘，一切人事大权都直接由大连民政署长大内卫之助掌握，他委派亲信佐藤雄太出任戒烟部理事，处理日常业务。戒烟部通过日商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俗称大连三井洋行）打着大连慈善机构“宏济善堂药局”的名义，伪称购烟是为了戒治中国人有鸦片烟瘾者所用，从海外大量购置鸦片。三井洋行采购鸦片货源主要是从波斯（今伊朗）、印度等地输入大连，再交由戒烟部收购。这种鸦片包装全用红纸（因此又名红皮子），每包重12两，约合1英磅，这是输入数量最多的一个品种。

大连三井洋行除从波斯、印度等地大量输入鸦片外，还从土耳其进口鸦片。从土耳其进口的鸦片质量较红皮子为次，从其外表来看好似干燥的“马粪”一样。它含有罂粟花和其它杂质，不太适合吸烟用，因内含的吗啡量超过其它烟土，大都适合作为制造吗啡的

原料。其次还有朝鲜产的鸦片，但数量不多。以上凡是从国外进口的鸦片烟土，三井洋行除按照民政署批准之数量处理外，还秘密进口一部分由戒烟部私下收购处理。戒烟部还从国内、国境边远地区如苏联的西伯利亚东部与我国边境地区以及吉林省的东宁、穆林、宁西一带收购鸦片，这些鸦片统称“边土”，在当地收购价大约合日元每斤三、四十元不等，运到大连后，价格猛升到每斤一百余元。中苏交界的海参崴和绥芬河（又名五站）是“边土”交易的主要集散地。“边土”进入大连，日寇是不批准的，因为这许多“边土”都是从走私者手中没收下来，但是日伪大连民政署按一些价格秘密卖给戒烟部，然后再由戒烟部转手卖给大烟馆。“边土”的包装外皮贴有“拂下品”字样用以表明这是没收处理品。因“边土”质量较次于“红皮子”列入二等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路运输不畅，“红皮子”鸦片价飙升，“土耳其”鸦片和“边土”也随之调整。1917年“红皮子”每10两（约合37.5克）为17.5元。直到战后的1920年价格才大幅度下降，每10两降价为5.8元，1921年再次降至4.3元（日元）。“边土”价一般每10两低于“红皮子”1元上下，

土耳其烟土每10两低于“边土”一元左右，1925年土耳其烟土，市价每10两降到2.5元。

宏济善堂戒烟部每年度所得利润，扣除收购原价以及员工薪资和其它开支外，以所得的纯益，用“特许料”的名目由大连民政署

审核后转呈关东厅，以“地方收入”的科目收入“国库”。1917年的纯益数5314065元，从走私者手中没收下来的鸦片土款尚未列入在此数内。这种所谓“纯益数”，是日本帝国主义用鸦片烟榨取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钱。不少家庭因吸大烟而倾家荡产、费时失业，有的人吸食上瘾后，从此精神不振、志消体衰，这是日寇“亡我中华”最阴险毒辣的手段，日伪大连民政署是罪魁祸首。

三、日寇在大连贩卖、走私鸦片流毒全中国祸及亿万家

1921年前后，宏济善堂戒烟部每年收购的各类烟土总价在1000余万元以上，而当时关东州的总人口也不过在100万人左右，市内能销售出去的最多也不超过150万元，余下的十分之七、八大量鸦片烟，就得利用各种渠道，向中国内地走私。大连地区积存的烟土，宏济善堂戒烟部帐面可查的近千万元，其他日本浪人和中国烟贩子秘密运进大连的烟土，总数更是惊人，因此老百姓说：“大连是鬼子贩卖鸦片的窝。”从这个窝里将鸦片向祖国内地渗透，从而流毒全国，祸及千家万户。

当时大连有权有势的日本人，看到经营烟土买卖有利可图，就以金钱贿赂殖民官员，然后再与中国奸商勾结一起，将部分“土耳其”烟土制造提炼成吗啡（老百姓称它为“白面”）。吗啡毒性超过鸦片烟膏，而且价廉，容易推销，随着鸦片烟一起大量流入内地，毒害中国人民。

在日本当局的明里暗中支持下，鸦片烟土和吗啡大量渗入内地，加上有暴利可得，因此吸引了大批浪人和奸商参加走私。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原广裕局经营者石本贯太郎及其同伙。自从广裕局撤消后，石本就在小岗子松山台（今西岗区松山街），租用一所大宅院，雇用了大批日本浪人和中国无业游民，专搞秘密走私活动。1916年春，石本派浪人无崎与宏济善堂部理事佐藤“秘密洽谈”，经佐藤“大力协助”，仅一次就从戒烟部非法购得“红皮子”烟土400箱（合64000英磅），每10两平均价为3元，总金额为2282000元，如按当时鸦片烟土市价每10两是4.3元，批发价是3.7元计算，石本在未走私前已获巨利，走私后所得利润更是一笔惊人数目。

石本贯太郎走私的得力助手是大连鸦片烟经营者“老前辈”潘忠国，以及中国商人朱春山、魏长德等人，通过他们在市内开设商号作掩护，挂羊头卖狗肉地大规模走私。由于走私鸦片土挣钱又快又多，可以不仅使一般平民和商人眼红，更为日伪贪官污吏打开钱财来源之门。日本殖民当局暗中支持贩卖和走私鸦片烟土，表面上欺骗舆论、蒙骗人民，装模作样到处设卡查禁鸦片走私，这就给贪污官吏趁机包庇、受贿、勒索创造机会，造成走私鸦片烟屡禁不止，愈禁愈烈的恶性循环，把大连市闹得乌烟障气，一团漆黑。由于鸦片烟是黑色，所以又名烟土。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有句俗话叫做“有土斯有财”，当时社会上谈拥有鸦片土，谁搞鸦片土买卖，谁就是大财主，谁见了“黑土”谁都动心，如大连有名德顺栈经理张之堂，裕长栈经理孙子杰等人，不好好地搞正业，却利用他们客栈的“客拉”（招揽顾客的）经常出入车站码头之便，为烟土走私者上下车、上下船包拿、包送，以此获利。客栈主人既是走

私货源的供给者，又是为走私分子提供方便和服务的幕后人。类似这种商号还有很多很多，这些商号和客栈想搞走私，必须和日伪警察、海关稽查等有关大小官员拉上关系，赠送巨款，为他们做保护伞，这样买卖生意才能安全兴旺，否则没收充公，坐牢就得光临到他们头上，此外还得用钱买通车站、码头的货物检查者和有关人员，鸦片烟上车、上船后对有关列车员及船员，更得随时“烧香”请求保护，才能求得安全，但是走私主持者还不放心，恐怕中途有变，不得不派遣得力打手，携带凶器 随船、车押运，确保鸦片烟安全到达目的地，如有特殊情况，这些“打手”们就得动手开枪来个“真格的”。车船上的工作人员把这些走私者称之为“烟贩子”，他们得到烟贩子的好处后，上至列车长、船长，下至杂役以至水手，都为他们“忠心耿耿”地卖力气。鸦片烟走私的方向主要是开往沈阳、天津、上海和烟台、威海、龙口等地的列车和客轮。这些“烟贩子”走私的方法真是五花八门，有的手提包箱中装上两层夹底；有的把鸦片烟土缝在棉皮中；有的装在手提棍的空心中；还有的把钟表内的机器拆除后装进烟土；更有的装入西瓜、南瓜中，或者混和在一般货品、日用品以至食品中。如果能与火车轮船关系者联络妥善，可把大量鸦片土埋在车船的煤仓中，这是比较最安全的。真是办法多样，各有巧妙不同。

四、日本官员插手鸦片烟的丑闻

鸦片烟土，不仅把大连地区日伪官吏、日本浪人特务、中国商贩以及各色人等都卷进了贩卖、走私烟土的浪潮，就连日本国政府的内阁总理以至大臣等官僚政客也都见“烟”眼红，竟不择手段地以搞烟土走私而获暴利。由于分赃不均，派系矛盾激烈，演出了一场为鸦片烟而狗咬狗的丑剧。

1919年12月31日晚上10时半，正是元旦之前的时刻，由大连开往沈阳的列车中，来了一位日本政府已退职的桦太地区长官平田走次郎，他安坐在一等车厢里，在即将开车的前五分钟，由大连大和旅馆（今中山广场大连宾馆）的服务员日人上田送上一个太皮箱递给他，这个皮箱是宏济善堂戒烟部理事小田贞次郎派上田送来的，箱内有价值12000元（日元）的“红皮子”烟土。因为小田认为平田官大可以冒险通行，所以事先没有和车站警察、海关查缉人员联系，那知事机败露，伪装皮箱内的烟土被当场查出，后经大连民政署长中野等人与海关方面交涉，这一官方走私案才算了结，但丑闻已传播出去。

1920年日本内阁拓殖局长官古贺廉造来连，住在大和旅馆时，宏济善堂戒烟部的小田贞次郎曾派人送去150余斤的“红皮子”烟土，外面包装用大连民政署官印封条贴上，做为官署一般公用物品，他们认为神不知鬼不觉，当时没有出事，但已引起古贺的

反对派注意，并因此爆发了一场鸦片风波。这次矛盾暴发的起因是早在1918年由日本三井、三菱等财阀支持的日本执政党执政后，插手鸦片烟的贩卖和走私，以获得暴利的结局。

1918年6月中旬，古贺又派遣其亲信蒲原基辅持密函来连会见中野。经中野、小田、蒲原三人数次秘密会谈后，在老虎滩僻静处的一个叫做“奴亭”的日本酒馆中秘密集会，商讨大规模进行贩卖和走私鸦片烟土的具体计划。日本人方面出席的有小田、蒲素和古贺的私人代表，以及刚从日本乘飞机赶到的大河平隆敏。中国人方面出席的有：杜毓楷、朱春山，以及朱春山的日语翻译范永才。会议按照中野事先拟好的方案，双方进行讨价还价式地协商，最后中日双方达成协议，并缔结了“契约书”一式两份。“契约书”的主要内容是日方以蒲原为代表，中方以杜毓楷为代表，中证人为小田贞次郎。契约规定由中方出资，用杜毓楷的名义开设商号，此商号由日方负责向关东州厅办理经营鸦片烟的特许执照。鸦片由戒烟部按原价拨给，但所有鸦片不能在关东州范围内出售，必须运到外地（也就是以走私方式流入东北和关内）。所得利润分配是“红皮子”烟土日方得八成，中方得二成；“边土”日方得七成，中方得三成。契约书是邓汉卿执的笔。

中方杜毓楷等人很快按契约书规定，在东大连（今中山区）监部通（今长江路民生街地段），开设特许经营鸦片的“兴泰号”商店，以大连民政署作为靠山，成为向内地大规模走私鸦片烟的大本

管。为免除沿途检查，载运烟土的大型包裹，一概由民政署协助，贴上大连民政署的官印封皮。由于警察归民政署管，所以走私鸦片警察知道了也不敢检查，反而还得多方设法保护其安全过关。这伙走私鸦片集团在古贺廉造操纵下，其走私范围越来越广，贪婪之心越来越大。1919年6月，在古贺的授意下，日本政友会大政客揖井盛寺来到大连与小岛贞次郎勾结在一起，由中方商人魏长德（德润号经理）顶名卖给日本浪人藤井三郎“红皮子”699贯（合5242.5斤）；“边土”15贯（合112.5斤）；总金额为71418230元。他们这样倒买倒卖，共获利14038830元。

1920年9月16日揖井再次与魏长德合谋，仍以魏长德顶名，由揖井负责，以低于市价20%的价格，经小田的协助，仅一次就从戒烟部购得“红皮子”50箱（合8000英磅），共获利20余万元。

在古贺廉造直接指挥下的大连地区贩卖走私鸦片集团除上述日方中野、小田、蒲原、揖井、藤井、国枝红，中方杜毓楷、魏长德等人外，还有日本政友会国会议员远藤良吉、日本浪人桑田蚕造、江崎瑞穗，中方的潘忠国、朱春山、张万帮等人参加。

古贺廉造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地搞鸦片贩卖走私，是得到了日本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原敬的默许和支持的，原敬之所以包庇古贺，是古贺能把所得利润大量送给原敬。但是原敬深怕事情暴露，所以一再叮嘱古贺要秘密进行。古贺认为上有总理，下有大连民政署长，

决不会出问题，但他没有想到原敬把政友会分子杉山田五郎安插在大连关东州厅充任事务总长，并要古贺与杉山经常保持联系。古贺认为这贩卖烟土的实权掌握在民政署长中野手里，况且又是秘密进行的，根本用不到杉山帮忙，当然也就没有必要互相联系，赚了钱更无必要分给杉山。古贺是傲气十足和贪心狠毒的家伙，虽然杉山和他同是政友会分子，但他从来就看不起杉山。杉山对古贺与中野的所作所为也有所闻，特别是从1918年起，鸦片收入逐年大幅度下降，由4,638,000元下降到1,948,000元，这说明是被中野一伙吞入私囊，只是抓不到实据。事情也正凑巧，刚好大连的殖民首脑——关东厅长官易人，由山县伊三郎接任，他父亲是日本大军阀山县有朋，与日本政友会矛盾很深，山县有朋风闻政友会分子在大连以权谋私，插手并操纵鸦片贩卖和走私，就秘密嘱咐山县伊三郎密切注意，伺机掀起倒阁风潮。山县伊三郎苦于收集不到实据，正在犯愁之际，想到石本贯太郎。石本是大连贩卖、走私鸦片烟的最早垄断者，自中野接任民政署长后，贩卖走私鸦片就得求助于中野帮忙，但中野不把他当作“自己人”，而把他拒之于门外，石本眼看“肥肉”被人抢去，当然又气又恨，为发洩私愤，就向新任殖民长官山县伊三郎告密。石本贯太郎是大连地区贩卖走私鸦片烟的“老前辈”，对中野等人搞的鬼把戏，他知道得很清楚，他的揭发举报使山县伊三郎下决心对中野一伙采取行动，但他又顾虑关东厅的事务总长，政友会分子杉山，怕他包庇中野，因此一再试探杉山

的态度，那知杉山早想惩办中野，只是没有机会下手，这次有了帮手立刻表示要和政友会脱离关系，转向到帝国军部的立场，山县伊三郎大喜过望，乃立即对中野一伙开始行动。一场狗咬狗式的丑剧就此开演。

1921年2月2日关东厅高等法院检察官安冈对宏济善堂戒烟部工作人员进行审讯。2月27日又搜查了戒烟部，可惜所有账目和文件已全部烧毁，于是安冈检察长亲自率领山川警务课长搜查了潘忠国、魏长德、朱春山家，发现了他们与中野等人来往的信件，并迫使他们交出了向中野等人行賄的罪证。3月7日关东厅检察部门对小田、梶井、蒲原、藤井、江崎、国枝红、桑田等人提出公证。3月21日对中野提出公诉。5月6日与6月11日分别对国会议员藤良吉、日本内阁拓殖局长官古贺提出公诉。7月28日宣布此案预审结束，各被告以 取罪移送关东地方法院法办，此时中野已在日本内地被逮捕归案。

关东州地方法院审讯时，市内万源栈经理张万邦、德润号经理魏长德等人都出庭作证，并当场交出中野、小田等人互相勾结受贿勒索的罪证。法院最后判处中野、小田、蒲原等人各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日本内阁撤消古贺廉造的拓殖局长官的职务，其余人犯一律释放。中野等人不服向关东厅高等法院上诉，结果被驳回。在公判大会上，各国驻奉天（沈阳）领事和西方各报记者都到场旁听，并把情况向各国政府反映，西方各大报也全文揭露日本官吏上

下舞弊贩卖走私鸦片烟土的真相。

中野事件引起日本国内朝野大哗，在野党宪政会和军阀官僚一致攻击政友会组成的内阁，要求原敬内阁总理辞职，并追究总理大臣原敬的罪责。日本各阶层人民群起反对原敬内阁，对大连殖民当局判处中野等人的徒刑认为是重罪轻判，应该重新审理从严惩罚。原敬内阁在这年召开的第四十五次国会上，代表政府极力辩护。但反对派对此仍纠缠不放，非要原敬内阁下台不可，因此原敬内阁处于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窘境中。后因国际上召开华府会议，使鸦片一案轰动全世界，日本国的形象也狼狈不堪。日本国内的争吵不休，导致日本国在国际会议中处于不利地位，经各方调解，原敬又运用行政权力，把此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大连殖民当局将中野、小田等驱逐回国，此事才接近尾声。日本国内的政友会内阁在国际会议结束后不久，因声名太臭也很快垮台。

五、瞒天过海、欺骗“国联”调查

日寇在大连贩卖和走私鸦片烟土，并没有因中野一案的结束而停止。实际上中野案件是属于日本政府内部腐败和派系斗争的狗咬狗，并没影响日寇亡我中华之野心，所以案件一结束，日本殖民当局内部整顿一下，把宏济善堂戒烟部换套人马，又照常进行贩卖走私鸦片烟土不误，特别是由大连向沈阳、青岛、天津等内地走私烟土的规模愈来愈大，致使内地烟民越来越多，真是祸及中华送毒全

国。为此当时中国政府一再照会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日本政府被迫发表声明，说是“如果在关东州对于鸦片中毒者（指上瘾）完全断绝供应鸦片时，将危及鸦片中毒者的生命，并将因此而走掉大量中国苦力的可能。这就会影响关东州之经营与发展。本着人道主义和经济上之立场着想，今后对关东州之鸦片，只能采取渐禁……”。日本政府根本不触及它贩卖走私鸦片的意图和事实真相。此后中国政府虽再抗议，但走私鸦片依然照常。

中野鸦片案暴露出来以后，日本政府不得不向各国发表声明，声称“日本政府对贩卖鸦片一向严禁，今后亦将严禁。至于大连地方官厅对少数有瘾之烟民供应鸦片，仅是人道主义的一种措施，这对日本政府严禁鸦片一事并无矛盾……”。这是日本政府做贼心虚，掩盖事实真相，以谎言来搪塞。特别是向中国内地大规模走私鸦片，声明中只字未提，更引起中国人民极大之愤怒。中国政府一再向日本抗议无效，乃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请求主持正义。

1927年世界各国派遣代表汇集海牙召开世界禁毒（鸦片、吗啡等）大会，日本和中国都有代表出席。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特派大使顾维钧在会上控诉日本在大连地区公开贩卖鸦片和向中国内地大规模走私鸦片等毒品的罪行，日本政府的大使却诡辩地说：“中国人民很早就吸大烟，我们接管大连后，采取的是戒烟措施，但对年老多病，实在不能戒除的人，不能不实行人道主义，不得不照顾他们的生命，一直到他们的生命终止。现在大连全市仅有八家